

Mikhail Bakhtin

国际学术界迄今最权威的
一部巴赫金研究专著

米哈伊尔· 巴赫金

[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
Katerina Clark / 著
迈克尔·霍奎斯特
Michael Holquist

语冰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0011681

B512.59
01



Mikhail Bakhtin

米哈伊尔·

巴赫金

[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 / 著
Katerina Clark
迈克尔·霍奎斯特
Michael Holquist

语冰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04875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哈伊尔·巴赫金/ (美) 克拉克 (Clark, K.) 等著; 语冰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300-01509-3/B·188

I. 米…

II. ①克… ②语…

III. 巴赫金-生平事迹

IV. K835.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3761 号

米哈伊尔·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

Katerina Clark 著

迈克尔·霍奎斯特

Michael Holquist

语冰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发行部: 62514146 门市部: 62511369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23 000 印数: 1—5 000

定价: 24.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2/12

☐	序言	1
☐	引言	7
1	■ 科西嘉孪生兄弟 1895—1917	25
2	■ 涅韦耳与维贴布斯克 1918—1924	51
3	■ 应答的建筑术	88
4	■ 列宁格勒小组 1924—1929	129
5	■ 参加宗教活动，以及被捕	162

6	■ 有争议的文本	198
7	■ 弗洛伊德主义	231
8	■ 形式主义者们	250
9	■ 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	264
10	■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282
11	■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	313
12	■ 库斯坦奈、萨兰斯克和萨维洛沃 1930—1945	331
13	■ 小说理论	359
14	■ 拉伯雷和他的世界	383
15	■ 从萨兰斯克到莫斯科 1945—1975	416
	□ 结束语	443
	□ 译后记	446



序 言

—— 个人的声誉史是一部各种分歧的记录书。某人的所作所为与世人对他的看法之间，彼此总是相去甚远。这些分歧有的是时间上的，例如对维科的迟到的“发现”；有的是空间上的，例如杰克·伦敦在美国地位平平，在苏联却声名显赫。然而，伴随着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1895—1975）的生平与声名的那些时代误解和矛盾错乱的看法竟比比皆是，这却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 20 世纪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正脱颖而出。他的著述涵盖了语言学、精神分析、神学、社会理论、历史诗学、价值论和人的哲学。此外，他还写出了更专门的著作，论述了活力论、形式主义以及陀思耶妥夫斯基、弗洛伊德、歌德和拉

伯雷的著作。在西方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就的哲学基础却鲜为人知。围绕他的声誉的主要分歧仍有待于消除。

迄今为止,围绕巴赫金的声名,那些最为醒目的颠倒错异一直都表现在时间上。20年代的巴赫金是俄国知识界的一位边缘人物,没有一家研究所或大学雇用他,了解他的只是一小群赏识他的朋友。30年代上半期,他因政治流放,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在1936年至1937年的一个短暂时间里,巴赫金在远离俄国知识界中心的莫尔多瓦,获得了一个师范学院里的教职。稍后,他在斯大林大清洗的恐怖岁月里,退居莫斯科附近的小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待在那儿。战后,他回到莫尔多瓦重操旧业,直到1961年退休。

在这些年代里,巴赫金撰述不辍,但极少发表。到1929年,他只在一家不起眼的外省杂志上用自己的名字刊登了一篇短文,他的所有其他论著都是以友人们的名义发表的。有一次,一本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准备在他自己的名下出版,巴赫金眼看要时来运转了。但当此书面世的时候,他已在列宁格勒知识界所遭遇的一次清洗中被捕了。在接下来的斯大林时代里,巴赫金只在一份商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集体农庄的簿记问题,此文是根据他在流放期间的工作体会写成的。30年代末,他想写一篇研究拉伯雷的学位论文,以便重新回到知识界的主流生活里。但是到论文被接纳的时候,又过了风云变幻的许多年。甚至在斯大林死后,巴赫金也只能发表一两篇文章,而且是在莫尔多瓦的地方报纸上。

这样，在世人眼里，从各方面看，巴赫金在 1929 年就死去了。直到学院生涯结束前夕，他才复活——那时，苏联研究文学的学者们重又对他发生了兴趣。这次复活使那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在初版 34 年之后，于 1963 年出了第二版。此书的重版，再加上 1965 年的一部关于拉伯雷的专著，使巴赫金声誉鹊起，他可以移居莫斯科了。他在流放期间的一些代表作被选译成英文，题为《对话的想像》，出版于 1975 年。就在这一年，他去世了。四年后他的另一部著作问世，译成英文时分成两卷，即《应答的建筑术》和《语言创作美学》。此书主要由巴赫金早年的笔记组成，这是他那被一再延误的一生的缩影。

写作日期与出版日期的不一致，再加上巴赫金在别人名下发表论著的习惯，导致了在评估他的成就时所特有的疑惑。像杰克·伦敦一样，在不同的国度里，对巴赫金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国外对他的发现各有其背景，这一点说明了那些分歧的由来。例如，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著作的译本在 60 年代晚期的法国出版，此时正值结构主义的高潮，因而在结构主义或符号学的语境下，这些著作似乎得到了真诠。巴赫金在英语世界里的声誉日隆是步他在巴黎风行的后尘，这使人们容易仅仅把他视为形式主义传统中的文学批评家，或者是研究狂欢节以及研究仪式对等级制之颠覆作用的理论家。在苏联则有很大分歧，许多人认为巴赫金是东正教传统下的宗教哲学家。

这里的差别乍一看好像是空间上的——俄国与西方，但在根底里却是时间上的。这大抵与译介方面的差距有关。巴赫金早期的著述最明白地表述了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那桩事业，这就是把他

的对话主义构造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但这方面的文字却刚刚翻译。这些早期论著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哲学基础，为他那些在语言学、文学批评和社会理论方面更加具体的思想提供了依据。

译介的差距所造成的疑难由于著作权问题而更趋复杂了。这问题便是：那常常归属在巴赫金名下但却以友人名义发表的三部著作和各类文章，果真出自他的手笔吗？这版本学上的难题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面对现有文献中的重大差异和矛盾，究竟应如何来为巴赫金定位呢？

缺乏可靠的材料是一个难点。巴赫金的家人或早年的友人都已谢世，只有伊·伊·卡纳耶夫尚在人世，但他对陌生人却三缄其口。结果，大多数见证人只了解巴赫金的晚年，或只是通过别人间接地了解他。没有诸如日记之类的私人文献保留下来。只有少量书信，大多是20年代以来的，而巴赫金素以疏于信札而闻名。也有现存的档案材料涉及他的亲人密友，包括他的哥哥尼古拉，以及卡甘、蓬此扬斯基和尤金娜。

关于巴赫金的苏联官方文件尚为数不少，包括他的工作履历和病历，但有些却渺不可寻了，如那份证明他何时大学毕业的文件。巴赫金本人对诸如文件和法律文书之类的东西淡然置之。而且，并非所有官方文件都真实可靠。有些——尤其是他的工作履历，是在事后很久补写的，那时巴赫金本人对往事已经淡忘了。甚至那些当时就写定的工作履历也并不一定反映巴赫金的真实情况，因为为了改善他的境遇，朋友们有时设法让他名义上在某处兼职，以便得到一份薪水或由此而来的一些便利。现有文件也有错乱矛盾之处，以至关于他的出生日期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既然巴赫金大部分幸存文稿都已付梓出版，许多已有译本，

那就该对他的总体成就做一番评价了。为此目的，我们到苏联做了三次学术旅行，查阅了巴赫金的档案以及图书资料，拜访了了解巴赫金的大部分幸存者。我们还去了英格兰和苏格兰，调查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哥哥尼古拉；去了布达佩斯，以考察卢卡契与巴赫金有何关联。这样，我们至少能够解决围绕巴赫金的一部分分歧和悬而未解的疑难了。

假如没有许多人和机构鼎力襄助，本书不可能面世。我们的大部分口头材料未注出处。经济方面的赞助，要感谢美国哲学协会、得克萨斯大学研究所、印地安纳大学研究所和研究生发展部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我们经常求助于伊利诺斯大学图书馆斯拉夫语资料部，尤其是玛丽·斯图亚特，她殷勤而又迅捷地在甚至最生僻的领域为我们提供了服务。彼得·斯坦纳、斯蒂芬·鲁迪、克拉拉·斯特拉达·杰诺维克、维多利奥·斯特拉达、A. 雅基莫夫和米利莎·柯兰帮助我们制定了书目。关于尼古拉·巴赫金的背景材料，我们得感谢圣安德鲁大学的 R.F. 克里斯蒂安，他向我们出示了尼古拉收到的家信；感谢伦敦的弗朗西斯科·威尔逊和斯坦利·米切尔；感谢伯明翰的 R.F. 维勒茨、罗埃·帕斯卡、芳尼娅·帕斯卡和乔治·汤姆逊；感谢牛津大学的谢治·柯诺瓦洛夫教授。我们特别受惠于卡利尔·爱默生，他阅读了我们的全部手稿。我们的朋友和同事瓦吉姆·莫纳诺夫提出了有益的设想并在资料方面给予了惠助。我们感谢伽利·骚尔·默森、詹姆斯·维尔施和西尼·莫纳斯的中肯建议，以及苏珊·莱顿、罗伯特·爱德华兹、卡罗尔·阿文斯和马克·冯·哈根在俄文资料方面的帮助。凯特·诺斯、嘉娜·柯特莱、玛丽琳·纳尔逊、莎农·詹波尔、道恩·索马，特别是凯伦·霍内，打印了我们凌乱的草稿，在

此深臻谢忱。我们尤其受惠于本书编辑、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弗吉尼亚·拉普兰特。最后，要感谢许多在苏联给了我们各种帮助的人们。撰写本书的乐趣就在于让我们获得了良朋益友。

作 者



引言

像米哈伊尔·巴赫金这样在世人眼中如此多姿多彩而具有动人魅力的思想家真是寥若晨星。巴赫金对多样性、偶发性和差异性的专注思考，相反相成地将他生平中那些令人眩目的矛盾和齟齬汇集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有一群盲人学究摸到大象身体的不同部位，便对这头动物评头论足，与此相仿，那些仅仅了解巴赫金这一或那一侧面的批评家们，对他的生平和思想也形成了不同的印象，其中有些是彼此矛盾的。

形成这些矛盾的一个原因是巴赫金的全部工作都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处在“一”与“多”的神秘关系之中。的确，在外在意义上，他发表的文字涉及的领域之广令人震惊，从形而上学到集体农庄的

簿记问题，有时还使用假托的名字。还有，他在不同的著述中操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语汇：有的属于新康德主义传统，另一些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还有一些则不折不扣是斯大林式的。在更深的层面上，不同面目的巴赫金从文本内部浮现出来。例如，他在理论著作所宣讲的原理在他更为专门的课题研究那里，却受到了嘲笑。多重的巴赫金甚至也出现在苏联专家那里，他们将他的名字与彼此相异的思想运动联系起来，从地下东正教教会直到倾向于革命的先锋派。

难以确定巴赫金对许多关键问题的看法，包括他与宗教及东正教教会的关系，他对俄国、苏联和西方的态度，以及他对构成其思想环境的各种运动、团体和朋友们的评价。造成这种困难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巴赫金缺乏了解，人们看他，犹如看一幅线条简单的思想白描，可以从现存的意识形态调色板上取用不同的色彩加以涂饰。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却同他的人格和信念有关。

这是一位对“变易”和“未完成”推崇备至的人，对他的描述不可能盖棺论定。巴赫金强调，自我永远无法同自身相合，而他也从未曾与任何团体或意识形态主张“相合”过。他与当时主要的运动及思想家进行对话，往往是诉诸纸笔而不是当面辩争。然而，他拒不加入或领导甚至谈不上追随任何运动。那些思想家及思想运动构成了他在其间运行的引力场，而没有对他施加一种固定的影响，或作为他信奉依从的一种主张。

巴赫金展露给世人的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矛盾重重的和暧昧不明的形象。他的公开活动与私下的精神生活是不一致的，他对后一方面最为珍爱。在公开言论里，他与当局及其论调相妥协。他不曾诟病那些违心让步的人们，根据政治环境的需要，他自己

采用了各种姿态。当考虑到检查制度而要求他修改文稿时，他没有气恼或显得难过，只是耸耸肩，修改了事。

然而，巴赫金的文本远不是纯粹妥协的产品。这些文本可以从许多层面上来阅读，他通过这些层面娴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撰述中，他既是一位热情宣讲自己观点的理论家，同时又能沉着地操用政治上稳妥的词句。他的大部分著作表面上是文学理论或语言学领域内的学术研究活动，但在底层，它们却是一些充满个性的宣言，常常有一种政治的或哲学的大义。可是，巴赫金实际上又不曾置身于俄国知识分子为真理而战斗的神圣传统之中，这多少是由于他对官方集团的不动声色、逆来顺受的态度决定的，但主要原因还是他根本反对“单一真理”的主张。

甚至在非官方的场合，巴赫金也很冷淡，表面上不与人争。他善于同各种主张的人们打交道，让人觉得他赞同他们的观点。当直接被问及自己的信念时，他不是回避就是沉默。

由于他思想发展存在着几个时期，要精确描画巴赫金面目的企图便更加困难。1918年至1924年前后是一个哲学时期，那时的巴赫金深受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尝试构思自己的哲学体系。在1925年至1929年之间，巴赫金告别形而上学，与流行的思想运动展开对话，例如弗洛伊德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语言学，甚至还有生理学。第三期是30年代，巴赫金在小说发展史领域探究一种历史诗学。最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他从社会理论和语言哲学的新视角重返形而上学。

这样，巴赫金徜徉在色彩斑斓的课题、思想、语汇以及假托的著者姓名之中。西方不同的派别如新马克思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家，分别把巴赫金引为同道，这不足为奇。巴赫金为

各种派别所接纳的沉重代价是牺牲其思想的多面性。许多人借重于巴赫金，但窥其全豹者却寥寥无几。

巴赫金的著作昭示了许多可行的研究线索，西方学者往往只专注于其中的一部分。有些文学批评家主要将巴赫金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专论的作者，因为巴赫金提出了一种新的以复调（polyphony）而知名的创作理论。另一些文学批评家、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巴赫金的拉伯雷专论而将他归为研究狂欢节及颠覆社会等级制的理论家。还有一些文学批评家、社会理论家和思想史家则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上将巴赫金视为同道。在他们看来，关键的文本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讲英语的批评家那里，巴赫金又以小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对话的想像》之中。所有这些对巴赫金的援用都是合理的，但没有一家兼收并蓄，包容那些巴赫金认为是自己最重要的思想范畴。

巴赫金首先并不是以一名文学理论家自诩。他自己努力要做的工作最接近于哲学人类学。他钻研了各式各样的课题，对他来说，这些课题本身便具价值。但在同时，他又将这些课题当作解决哲学问题的不同途径。他贯穿在各种主题、姿态和声调当中的那个目标，可以看作是同一种哲学探索，这样，巴赫金的多重面目便融合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形象了。

但这个较为完整的形象永远无法转变为一个单一的、确定的巴赫金。事实上，试图一劳永逸地描画出轮廓分明的“真正的巴赫金”形象将会悍然不顾他的全部主张，这样一种威严的造型可能具有专横的意味。无论如何，巴赫金永远是一位教规的反抗者，如果声称他的某一种形象是正确无误的，就将束缚这位倡导多样性的哲学家，将使这位“复调”歌手成为“独白者”。

不幸的是，有太多的人误入歧途。60年代和70年代，巴赫金成了莫斯科知识界的偶像，他们为他蒙上了圣徒的面纱。在那些年代里谒见过巴赫金的人现在描述他的口吻，往往令人想起在个人崇拜的鼎盛期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形容。这既足以引起警惕，也具有讽刺意味。许多人证实说，同巴赫金的会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给人的印象是具有完美的悟性。他仿佛是一块磁石，引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人们对巴赫金的性格也寄予过高的期许，许多人把他面对斯大林主义的迫害所表现出的忍辱负重看作是圣徒的标志。

对巴赫金的个人崇拜几乎是对他的诅咒。然而，他对此的态度想必不是震怒或惊愕，而很可能只是一笑置之。巴赫金喜爱恶作剧、促狭鬼和怪人。彻底颠覆社会的和观念的等级制使他充满乐趣，这具有狂欢节的特征。甚至有人误解他的著述，将他奉为圣徒，这也一定会使他忍俊不禁。事实上，巴赫金毕生嗜读《十日谈》里的“夏泼莱托先生如何变成了圣夏泼莱托”^①，这是一个阴错阳差被人封作圣徒的故事。故事说，一个奸商一生都在撒谎、行骗和通奸。在一次旅途中，他病倒在一座陌生的小城，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他唤来一名修士为他做忏悔。这个恶人花言巧语，还搬弄天主教的教义，竟使修士相信他一生行善，前无古人。这个撒谎的商人死后葬在圣地，修士逢人便说他发现了一位空前的圣人。不久，香客们被引到了这位昨日奸商今日圣徒的墓前，那里便开始出现奇迹。

巴赫金在最后已经不能自己阅读的日子里，又请人为他念了这篇故事，这说明了巴赫金其人的个性，例如他的非正统的宗教信仰，以及他的坚信对话的力量、权威的狂欢化以及创作的奥

秘。故事还对巴赫金的身后之名具有意义。对于我们两个作者来说，这可以当作一篇讽喻故事，警告我们不要在巴赫金式的夏泼莱托先生那里，充当上当的修士的角色。故事还能提醒我们的读者，不要将任何一种有关巴赫金的解释奉为圭臬，包括我们的解释。虽然我们希望不要重蹈薄伽丘笔下轻信修士的覆辙，但仍愿意庆贺一个小小的奇迹——在遭受迫害、文稿散失或张冠李戴以及转译阐释之后，在饱经沧桑之后，巴赫金的思想仍熠熠闪光，他与世界的对话也仍在持续。

藏传佛教讲，有第三只眼的人可以洞见那控制万物的神秘统一体。巴赫金则仿佛有第三只耳，使他能别人仅知有“同”的时候谛听到“异”。这一感觉促使他重新思考：“异”如何被习以为常地仅仅当作“同”的表象。他几度尝试为多样性找到一个专门的称谓，例如“杂语”（heteroglossia）或“复调”，他尽心尽力，从来不曾使充满活力的反论和对立完全窒息，这是他事业的灵魂。他总是设法将任何概念体系所必不可少的同一性降至最低限度。面对“异”，那些粗心大意或缺乏耐心的思想家们常常感到难以容忍，因而匆匆贴上“同”的标签，他却努力加以保护。面对最精致的范畴也难以把握的复杂现象，巴赫金的这种耐心本身也是一种勇气。巴赫金不惧怕被存在的洪流所淹没，从不惮于别人指责他缺少理论，因而不曾违心地做出匆忙的系统概括。这种对多样性的敏锐感觉将额外的负担加在某些人的肩头，这些人想为巴赫金自己的思想找到一条总纲。我们必须学会在描绘他思想的同时，不断倾听他反抗最终定论的谆谆教诲。

巴赫金向读者提出的最大问题不是要吸收一套陌生的新名词，也不是要重新思考任何个别的认识范畴。事实上，运用那些